

中国共产党国防社会动员的 历史逻辑与战略文化积淀

●苏世伟

摘 要:回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防社会动员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战略文化的新积淀:社会共识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为党的政权建设和新中国国防社会动员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国防社会动员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逻辑起点,强化了大众的民族意识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尤其是民族精神的提升,成为战略文化沉淀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防社会动员;历史逻辑;战略文化积淀

中图分类号:E0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2)04-0182-05

作 者:苏世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空军空降兵学院副教授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居安思危,国防动员对保证民族复兴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当前国内学界大多关注国防经济动员,而对国防社会动员的研究有待深化。国防社会动员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防经济动员、国防政治动员及国防军事动员等并列构成国防动员体系。当代世界体系中,国家的国防社会动员能力正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和对抗的焦点。

所谓国防社会动员,是指人们在参与国防活动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态度、希望与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行动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国防社会动员的历程,赋予中华战略文化新内涵、新境界。精神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国防社会动员的逻辑起点,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构成战略文化的新积淀。中国的发展只是部分地从属于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由于历史前提的差异,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具备鲜明的特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与现代文明相伴,却容易忽视其历史的规定性。社会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等的变化,必然影响整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构建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思想课题,这不仅是国家建设使然,也是思想进一步解放的需要,乃至是哲学新形态的启蒙。

近年国内外兴起的战略文化研究热,不但使相关理论探讨进一步深入,也使人们愈加思考当下战略文化的实践指导意义。“研究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性质及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从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从中国 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出发。”^[1]¹⁸科学剖析中国国防社会动员的历史逻辑与战略文化的新积淀,有助于理论提升,也利于国人在更开阔的视野上思考中国道路。

革命战争的动员奠定了新中国政权建设和国防社会动员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军事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和标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2]“战争作为一种代表国家意志的行为,进行政治、文化与社会动员可能比经济动员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只有先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动员凝聚了全民族的共识,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在政府作用领域之外发挥社会自我动员的影响,才能谈得上进行后续的有效经济

动员。”^[3]¹

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是启动政权建设乃至创立现代国家的基础,当代的国防社会动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战争年代,面对落后而分散的低组织化社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取得国家政权,一直将社会动员当作建政的合法手段。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党的动员网络遍及全国,深入广泛地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建国后,由战争动员为主的党的动员网络,主动转型到国家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引擎,其辐射、内聚、整合功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国外执政党,为国家崛起提供动力。与此相应,研究中国当代的国防社会动员,必须厘清战争年代党进行社会动员的轨迹,才能明晰其历史起点和发展逻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先要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4]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当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动员工农阶层,发动新式社会革命,中华民族才有走出苦难、走向独立的希望。革命动员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天然的联系。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失败,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有机结构,长期的积贫积弱,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国家发展的扭曲。特定的历史环境,松散的社会结构,呼唤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将高度碎片化的社会重新凝聚起来。谁能激活下层群众、凝聚社会力量?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党的首要任务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5]⁵。将动员工人阶级等底层群众参加暴力革命作为建立新政权的途径,这就明确了革命动员的对象和道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系列工人大罢工,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动员对象由单纯的工人进一步扩展至农民后,形成了农民运动狂潮;运动重心转到农村,又掀起了意义深远的土地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动员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依仗的法宝,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成为难忘的历史记忆。到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遥相呼应,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逻辑是其阶级属性使然。无产的工农阶层不属于某个社会集团,处于分散状态;无私的党需要团结民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容易与无产的工农结成天然的同盟,这一同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党只有动员工农群众,才能壮大力量,同革命的三大敌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践行党的纲领,同时也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说的好:“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6]⁵²²最重要的,如何使几千年来奉行中庸之道、甘做良民的劳苦大众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成为了这一问题的最优解。当然,“广大工农民众的参政意识之薄弱和参政技能之缺乏,也使得这一方式易被认同和接纳,从而落地生根、挥之不去。”^[7]²⁴⁶例如,抗战时期,扫盲教育是党在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的一项社会活动。在提高识字率的同时,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逐渐提高,对中共政权和各项政策进一步认同。

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往往从改变社会结构和权力机构入手,壮大革命力量,尤其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要有相应的权力技术,还必须构建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大革命时期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农会组织和党团组织,对工农阶层进行教育和动员。到土地革命时期,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基层结构,使土地革命才得以深入开展。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形成一整套社会动员机制,减租减息、大生产等运动,都是在这个结构的主导下进行的。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基层党组织、农会以及农民代表会议为主的基层政权结构。

中国封建王权体制内部严重的人身依附,不可能产生变革社会的主导力量。建立现代国家必然地依靠体制外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新的组织方式构建了国家的核心力量。“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7]246}由此,历史挥就了由先进政党通过社会动员而构建现代国家政权的政治奇观,党的社会动员能力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政府、议会等,形成了一个基础广泛、协调有序的国家政权控制系统。

动员的本质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接触、鼓励、宣传和教育等,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宣传与组织等动员策略的运用,没有对民众的利益诱导与情感激励,没有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就不可能将中国社会有效凝聚起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革命的成功和民族的独立。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从自身所处的环境,观察各种关系并判断自己的位置,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以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为认识起点,再进行经验归纳和分析,这一思维特征成为社会动员的中国注释,具有方法论启示。人的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地试错,进而为“相对正确”的认识开辟道路,任何一种理想信念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存在形式。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就是中国先进分子实现国家独立理想的有效手段,不但经受了历史检验,还成为文化积淀的载体。

新中国国防社会动员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社会动员除了应对国家战争需要外,还要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需要,既要保持战争年代“战时应战”功能,又要满足“急时应急”需要,还要具备“平时服务”功能。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战争需求巨大而国防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防社会动员无疑要进行艰巨的战争担当。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国防社会动员就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线建设等,无不以广泛的社会动员为基础;从战胜“非典”疫情、汶川地震救灾到系列海外撤侨行动,展示了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参与的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

西藏和平解放、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面对逐渐稳定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同时指出“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资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件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8]62}此后,国防社会动员与军事战略方针相适应,不断调整。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中苏关系破裂,新中国面临严峻的战争压力。特别是中苏边境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事件后,党的九大正式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这是军事战略方针的再次转变。同时,全民动员,坚决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建立“劳武结合”的国防后备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旗帜下,使国防社会动员的规模达到又一个顶峰。改革开放后,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论断。随着改革开放和冷战后期中苏关系的缓和,裁军和军转民成为世界潮流,国防社会动员趋于理性和适度。

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国防社会动员表现为阶段性、动态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中国国防社会动员阶段性特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周期是吻合的,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紧密相连,尤其与美、苏等主要国家的军事战略变化高度关联,但是60多年的经验表明,国际因素对国防社会动员的影响显然服从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因而本土因素对国防社会动员有根本性影响。从不同时期的国防社会动员来看,往往立足国内现实,依据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对本国的影响做出合理推断,以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要求和本国军事战略要求。而从国防社会动员发展的动态性上看,国家的大事件或者国内形势的变化,往往造成动员的现实需求,围绕重大战略变化的社会动员较多,一旦国内外形势发生新变化或者新的影响因素涌现,动员就发生根本转向,这种状况对于生产和生活往往造成负面影响。再从国防社会动员的不均衡性上看,表现为动员实践与动员理论研究的不均衡,动员操作过多,动员理论研究得不到重视,实践表现出粗放型动员;国防社会动员不均衡性还表现在参与群体上,往往以青年群体的动员为重点。改革开放30余年,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追求和谐与效率的大前提下,国防社会动员的发展又表现出平稳性和连续性。随着国防社会动员策略的转变,物质利益原则成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主要驱动。但是,单纯的物质利益的动员作用具有现实性,难以持久,作用短暂且不易深入。

注重精神激励和物质引导相结合,成为国防社会动员操作的基本准则。

新中国国防社会动员的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和民生为中心,没有大规模的国家危机,就不进行国家层面的国防社会动员。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依赖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高度统一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高度一致的动员失去经济根基,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必然。农村公社的解体,城市多种经济成分的兴起,新的社会主体不断形成并日益庞大和独立,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空间相对缩小。动员基础和环境的变化,使国防社会动员由粗放狂热向精细有序转变,由全民总动员向重点动员转变。

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国防社会动员的组织方式和内容也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的职能经历了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政府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政府职能也从以政治职能为主向以经济职能为主转变;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政府职能进行第二次转换,从以经济职能为主向以政治领导和社会管理为主转变。进入新世纪,与政府职能的第二次转换相适应,政府是国防社会动员的规划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注重动员的战略管理和调控,不必大包大揽。目前,政府能够用于国防社会动员的组织力量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各类人民团体、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二是各类民间组织。由社会力量自发生成的民间组织,具有本源的社会功能,是值得各级政府组织、整合、吸纳的力量。从战胜“非典”疫情、汶川地震救灾到系列海外撤侨行动,民间组织在国防社会动员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国防社会动员组织方式的变化,在形式上是国家治理政策的转变,实质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共同推动的结果,是对历史文化和国家现实的回应,在一定意义上,展现的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

新中国的国防社会动员强化了大众的民族意识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国家的热情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性。尤其是民族精神的提升,成为战略文化沉淀的重要内容。

国防社会动员与战略文化的新积淀

1840年之后,我们一直面对着国内外的严酷追问。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度,为什么在近现代如此衰落?新世纪,当我们重现崛起端倪之时,为什么依然负重深沉的社会迷茫?因为我们没有清晰地定位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国外的、传统的借鉴恐怕都是有限的,现实呼唤我们进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突破,最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实践进行总体性反思。回眸革命战争和国防社会动员之路,是进行总体性反思的捷径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战略文化的新积淀——社会共识和民族精神的提升。

目前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对战略文化的概念和体系还有一定的争议,但还是能从总体上把握战略文化的属性。战略文化,是以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为准绳,以人和社会的具体行为作载体,经检验能有效指导实践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战略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展示了其显著的遗传与继承特征。从汉宣帝时代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9],到毛泽东时代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战略文化的传承掷地有声。战略文化的指导领域不仅以军事和外交为重点,国家内部治理的艰难往往更能彰显战略文化的特色,“治大国若烹小鲜”,尤其在国家发展的战略指导上,稍有不慎,就可能酿致危机。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与不确定的环境,是战略文化在与实践结合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当代中国战略文化就是在这一矛盾的运动中,演绎着自身积淀与传承的历史逻辑。

国防社会动员的实践智慧沉淀为战略文化。国防社会动员从“应当做什么”的价值思考到“如何去做”的理性判断,动员主体的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动方式等彼此交融,成为观念形态作用于动员实践过程。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悄然传播着与当时主导体制相异的思想,并逐渐扩大追随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进理念的感召,使广大党员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并用行动捍卫纯洁的理念,自我规范自身行为。在国家建设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党内坚定的认同和团结,感召社会的一般大众。新中国诞生后,以文学、影

视、广播等主要媒介为载体的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了独具中国魅力的社会动员效应。对新中国合法性的积极诠释,对人民群众建设激情的充分调动,当年巨大的动员效应是不能用今天流行的传播理论评估的,而且其影响依然在与时俱进。在国防社会动员中,意识形态型的动力机制,造成动员的剧烈、广泛和长周期,对社会的影响也深远,成功后甚至可以造成社会制度、道德体系与行为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国防社会动员机制反过来需要参与者坚定的信仰、勇敢的献身精神,需要组织者坚定的理念、深入的发动。总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不但培养了大众参与社会动员的情感和态度,作为社会相对成熟和发达阶段的思想,成为战略文化的新沉淀。

战略文化作为战略的底蕴和根基,除了对战略决策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也关注着人与社会生存方式,具有规范公共理性、传承人文情怀的作用,体现着人类的自觉选择。中国社会转型之际,迫切需要激发个人及群体的理性自觉,直面生活,打造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当代中国战略文化迫切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人文智慧的新的历史诉求。当前,中国人在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上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缺少与物质财富积累相匹配的强大的精神体系。百年来中国的思想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精神信仰的缺失,使人产生无根的漂泊者之感。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到底在哪里?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10]¹³⁴,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以及日常行为都与伦理本位紧密相连,中国自古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社会,是家庭生活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如今在信息发达的时代背景下,独生子女的小型化家庭,伦理本位能否依旧传承延续下去?类似质疑对中国未来的精神信仰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远远超出政治、经济层面,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积极构建与物质财富积累相匹配的精神体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主动担当,这一精神体系不应止于政府倡导和学界探讨,而应扎根于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与每一个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相伴随。精神体系建设要比发展经济艰难得多,不但复杂,而且长期,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战略文化崇高的价值追求引领社会登上更高的阶梯。雅斯贝斯指出:“以往,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样子而被接受的;现在,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使生活成为它所应是的状态”^[11]⁵。新中国的战略文化沉淀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应是的状态”的结果。充分认识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国家团结与国防社会动员的互动意义。以历史之识,求现实之得,才能把握大国崛起中国国防社会动员的特点和规律。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正在从本能、移情的权威认同为主,向自觉、理性的权威认同为主转变,使超大社会的国防动员面临新挑战。当代有价值的国防社会动员,不但吁求动员方式的转变,而且呼唤民族文化的自省与自重,不能面对全球化就轻易动摇我们的传统,要在动员蓄势中,固化自己的根基,超越西方遏制。

参考文献:

- [1] 荣剑. 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1).
- [2] 史记. 孔子世家[M].
- [3] 约翰·霍恩著, 卢周来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政府、社会和动员[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 [4]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6]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美)李侃如著, 胡国成、赵梅译.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 [9] 汉书: 卷七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 [M].
- [10]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 [11] (德)卡尔·雅斯贝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朱加荣)